

# 中国居民消费结构 波动周期实证研究: 1979 - 2014

朱惠莉

摘要: 本文运用结构变动指数测度了 1979 - 2014 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情况, 并对两大主体消费结构波动的周期性特征进行了刻画。城镇居民消费结构( 1982 - 2014 年) 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1979 - 2014 年) 波动分别都经历了 7 个周期,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相对城镇居民来讲具有滞后性, 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相对趋于活跃, 充满活力。基于此, 政府应当有针对性地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推动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以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原动力。

关键词: 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周期;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指数

中图分类号: F1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1569( 2016) 01 - 0137 - 07

DOI:10.13658/j.cnki.sar.2016.01.017

##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 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 作为消费实现形式的居民消费结构, 经历了阶段性明显的变动历程, 其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 结构档次不断向更高阶段跃升。然而, 由于长期受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者行为和消费方式等多方面存在差别, 尤其是在消费结构变动上的重大差别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差别的重要方面。因此, 研究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发展历程, 把握其变动规律, 深入分析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内在特征, 提出相应的结论和建议, 对于缓解我国长期存在的居民消费率低迷现象, 实现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变,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居民的消费结构反映了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 是衡量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为了解决内需不足问题, 我国学者围绕着居民消费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 特别是关于居民消费结构的问题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对消费结构演变( 或升级) 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对比研究是关于消费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周建和杨秀祯( 2009)、吴薇( 2010)、赵金蕊( 2013) 和李姗姗( 2014) 发现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存在差距且城镇对农村具有“示范性”影响效应。李晓楠和李锐( 2013) 研究发现, 我国农户消费结构的优化程度依次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还有学者从其它角度对消费结构展开了相关研究。刘妮娜和张汝

作者简介: 朱惠莉,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飞(2013)指出新生代城市流动人口消费能力最强。刘海云(2011)和查道中等(2011)指出由于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会导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作用不同。以上研究成果借助于各种模型和工具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基本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差异,对我国相关经济政策的调整,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动态演进过程进行研究和分析,因此影响了他们对居民消费结构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有效的科学判断,从而使得建议和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基于此,本文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为研究目标,通过考察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演进过程,尝试使用结构变动值指数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大主体消费结构变动的周期特征,并从二者消费结构的动态变化中探讨居民消费的周期规律,最终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动力机制提供经验与理论支撑。

## 二、1979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演变过程<sup>①</sup>

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经历了从基本的物质型消费逐步向发展型和享受型生活消费升级的过程。但是,受二元经济的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演变过程,有着极大的不同。我国城镇居民在1995年提前结束了生存型消费阶段,2001年进入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比重明显上升阶段,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演变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正在经历消费结构演变的第三个阶段。而我国农村居民直到1999年才结束生存型消费阶段,之后进入生存型消费为主,发展型、享受型消费逐步增加阶段。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缓慢,消费结构的演进过程正好经历了两个阶段,消费升级的第三个阶段则刚刚开始。

### (一) 城镇居民消费及其结构的演变历程

第一阶段 生存必须的物质型消费阶段(1994年以前)。1994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首次下降至50%以下,这意味着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有了重大发展。其中1979-1983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主要是对长期未得到满足的生存性基本物质消费需求进行数量上的补偿。自1984年起,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发生了首次转变,生存性需求的占主导地位逐渐消失,便利性新兴耐用消费品开始普及。这一时期,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百元级的消费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向千元级消费品(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甚至万元级消费品转变。至1994年,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彩电86台、电冰箱62台、电炊具75件、空调5台、淋浴器25台、吸尘器9台。与1985年相比,1994年食品和衣着类支出下降了3.23%,而通讯、居住比重则分别提高了2.51%和1.98%,66.3%的家庭使用了煤气或液化气,23.2%的家庭安装了电话,30.5%的家庭拥有自主产权的住房。

第二阶段 生存型消费为主、发展型消费逐步增加阶段(1994-2000年)。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首次突破40%,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实现了由生存型逐步向发展型和享受型的消费结构第二次转变。城镇居民消费序列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衣着类消费品从1995年的第二位下降到2000年的第四位。同时,城镇居民消费范围不断扩大,住房、医疗、文化教育及假日、旅游等消费逐渐活跃。这一阶段,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1)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增长幅度大,微波炉、空调、电脑等成为消费热点;(2)1995-2000年,医疗保健支出比重由3.1%上升到6.4%,年平均增长率为23.7%;(3)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628元,比重从1995年的8.8%上升到2000年的12.6%;(4)1995-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交通通信支出增长了131%,比重从4.8%上升到7.9%。其中,每百户

城镇居民家庭固定电话拥有率由39.6部增加至80.5部,移动电话和家用电脑实现了零的突破,分别达到19.5部和9.7台;(5)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从休闲中获得生活的乐趣,假日消费、旅游成为消费新宠,城镇周边游和周末游获得快速发展,城镇居民假日消费、旅游方面的支出比重开始增加,2000年城镇居民消费人均旅游支出88元,比1995年增长167.6%。

第三阶段,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比重明显上升阶段(2000年以后)。2000年以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正在经历第三次转变,以住房、汽车、旅游、文化体育、休闲、通讯及数码电子消费品等为代表第三次消费升级正在逐步展开。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9381元,比2000年增长了23101元,年均增加1650.1元,人均消费支出19968.1元,是2000年的4倍。至2014年,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的支出水平分别达到6000元、1627.2元、4489.6元、1233.2元、2737.3元、2142.3元和1305.6元,分别是2000年的3.04倍、3.25倍、7.94倍、3.29倍、6.18倍、3.2倍和4.1倍。此阶段我国城镇居民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呈现以下特点:(1)自2000年以来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保持着年均25%以上的增长速度,到2014年达到12339.4万辆。其中,2014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家用汽车拥有量达到25.7辆,比2013年的22.3辆增加3.4辆,比2000年的0.5辆增加25.2辆;(2)住房消费仍是消费结构升级的重点,城镇居民中有90%的人有了自己的商品房。2000-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20.3平方米增长至32.9平方米。同时,与住房相关的建材、装饰、家居等领域的消费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3)伴随着手机和电脑功能的日益完善,电子产品已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消费品,人们的消费方式逐渐发生了改变,通信与信息消费持续增长,网络消费成为居民消费的新宠。

#### (二) 农村居民消费及其结构的演变历程

第一阶段,生存型消费阶段(2000年以前)。改革以后,随着农民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伴随着农村居民跨入温饱阶段,食品类及、衣着类消费支出比重开始较大幅度的下降,而居住、文化娱乐用品、服务性支出比重开始增加。自1990-2000年,农村居民的食品、衣着、居住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由58.8%、7.8%、17.3%和5.3%,下降至49.13%、5.75%、15.47%和4.52%;而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由3.3%、1.4%和5.4%,上升至5.24%、5.58%和11.18%;其他支出则由0.7%上升至3.14%。至2000年,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富,生活耐用品开始普及,农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48.74台,电冰箱12.31台,洗衣机28.59台,另外,如移动电话、空调、电脑等现代家庭耐用品也开始进入农民家庭。

第二阶段,生存型消费为主,发展型、享受型消费逐步增加阶段(2000以后)。2000年以来,由于各级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和相关惠农政策的大力支持,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大大提高,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253.4元增加到2014年的9892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1670.1元由上升至2014年的8382.6元,年均增加479.5元。2013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突破40%,下降到37.7%,这意味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第二次重大转变。这一阶段,农村居民的食品类及衣着类等生存性物质消费比重进一步下降,同时发展型、享受性消费支出的比重普遍提高。此阶段,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家庭耐用品及设备用品在农村快速普及。2014年,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及洗衣机分别为115.6台和74.8台;摩托车为67.6辆;家用汽车保有量为11辆;(2)交通通讯消费支出大大增加,增长倍数和百分点均占八类消费支出的首位。2014年,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固定电话及移动电话分别增加至38.9部和215部;农村居民交通通讯支出占比为12.08%,比2000年提高了6.84个百分点;(3)医疗保健支出持续增加。2014年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为8.99%,比2000年提高了3.42个百分点。

## 三、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波动的周期性特征及对比

## (一) 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指标的测度

目前,国内研究消费结构的变动研究者基本没有使用“消费结构周期”这一概念;国外也极少有人将“消费周期”这个概念运用于关于消费变化的研究中。本文在这一部分将采用分析经济周期波动的概念、方法、理论,对1979-2014年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波动状况进行具体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动态变动过程及消费结构变动的内在规律特征,这里首先引入产业结构测度指标——Moore结构变动值指数,用Moore指数来衡量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情况。结构变动值指标运用空间向量测定法,以向量空间夹角为基础,将n个产业视为一组n维向量,把两个时期两组向量的夹角作为表示产业结构变化程度的指标。所以,Moore结构变动指数能够较为准确和灵敏地揭示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与程度。基于此,本文采用该指标来衡量消费结构变动的过程和程度。

Moore结构变动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M_t = \frac{\sum_{i=1}^n W_{it} W_{i,t-1}}{\left(\sum_{i=1}^n W_{it}^2\right)^{\frac{1}{2}} \cdot \left(\sum_{i=1}^n W_{i,t-1}^2\right)^{\frac{1}{2}}} \quad (1)$$

式中, $M_t$ 表示Moore结构变动值, $W_{it}$ 为第t期第i部分所占比重, $W_{i,t-1}$ 为第t-1期第i部分所占比重。 $\theta_t$ 定义为从t-1期到t期两期向量间变化的夹角,则有:

$$\theta_t = \arccos M_t \quad (2)$$

(2)式表明,如果向量间变化的夹角越大,即 $\theta$ 值越大,则意味着结构变动的幅度也越大。

表1 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值

年份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年份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年份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1979	--	0.054223	1991	0.045586	0.023676	2003	0.024414	0.037568
1980	--	0.043414	1992	0.031716	0.017812	2004	0.025836	0.036415
1981	--	0.038660	1993	0.039246	0.048300	2005	0.030764	0.085712
1982	0.029265	0.020868	1994	0.019961	0.012580	2006	0.025970	0.060324
1983	0.011696	0.021165	1995	0.025195	0.009255	2007	0.023204	0.036352
1984	0.023176	0.017010	1996	0.036485	0.025267	2008	0.047362	0.025670
1985	0.079895	0.020471	1997	0.044601	0.022537	2009	0.036085	0.057255
1986	0.076851	0.037850	1998	0.046101	0.030207	2010	0.032558	0.025580
1987	0.025003	0.036770	1999	0.04823	0.018903	2011	0.024147	0.033021
1988	0.049495	0.029477	2000	0.053702	0.053652	2012	0.015389	0.022210
1989	0.065051	0.023582	2001	0.031378	0.029289	2013	0.034853	0.038564
1990	0.067458	0.066938	2002	0.086325	0.026113	2014	0.025647	0.014415

这里根据1979-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项消费支出数据,使用结构变动值计算公式(1)和(2),其中n是8维向量<sup>②</sup>,分别计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值并绘制变动值曲线图(见图1)。

## (二)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波动的周期性特征

图1记录了1982年以来33年的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值的波动情况。在这33个增长率数据中,最高峰值为0.086325(2002年),最低为0.011696(1983年);有9个峰年,分别

是: 1982年(0.029265)、1985年(0.079895)、1990年(0.067458)、1993年(0.039246)、2000年(0.053702)、2002年(0.086325)、2005年(0.030764)、2008年(0.047362)、2013年(0.034853)。观察图1可知,按照“峰-峰”划分法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周期是比较合理的,这样出现8个消费结构变动周期。但是,考虑到1993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显示出一个小小的反趋势性的轻微向上跳动,而后立即按照下降趋势快速掉头向下,因此在这里仅仅把它作为一个偶然性的波动来处理,而且从接下来的变化情况看,1990年到1994年,这一阶段整体上是一个结构趋稳期,所以,这里不将其视为一个波峰。基于上述情况,这里用“峰-峰”法把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过程划分为7个周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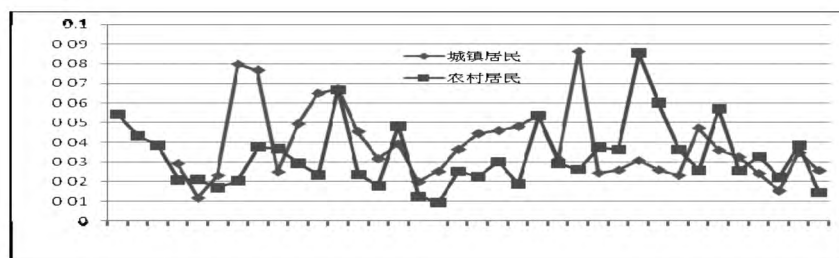


图1 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值曲线

依“峰-峰”法划分,1982年以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共经历了7个完整的消费结构周期,消费周期的平均波长为5.43年,符合短周期波长范围;从周期长度来看,2000年以后,波长有变长的趋势。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周期的平均幅度为0.049082。第1、第2、第4和第5个周期的波幅高于整体平均波幅水平,时间跨度为1982-1990年和2000-2005年。1982-1990年波幅较大原因可能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短缺的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人们长期被抑制的消费需求突然间释放出来,消费结构得到较大的调整;这一阶段正好是出现两个较高的消费增长率的时期,且这一阶段城镇居民的消费是非理性的。2000-2005年这一阶段波动幅度较大,外在的原因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城镇各项改革政策的推出,比如住房制度改革、高校教育改革、养老制度改革和医疗制度改革等,内在原因则是由于2000年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开始进入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比重显明上升的阶段,外在与内在原因的叠加共同导致城镇居民在这一阶段消费结构发生剧烈变动。周期高度的平均值为0.07066,最大值出现在2002年(0.086325),最小值出现在1983年(0.011696)。从峰点值的发展趋势来看,峰点值有下降趋势,波动水平降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波动曲线有7个谷点,平均值为0.021578。消费结构周期谷点值的最大值出现在2001年(0.031378),最小值出现在1983年(0.011696)。消费结构周期波谷的变化趋势表现为,波动下限不断下降。城镇居民消费周期的平均位势的均值为0.042975,平均位势逐渐走低。结合高度、深度和平均位势可以看出,2000年以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逐渐趋稳,说明如果没有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很难再有大的变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周期波动的平均活跃期为3.14年,平均趋稳期为2.29年,消费结构波动周期的活跃期和趋稳期都不长,而且活跃期略长于趋稳期,同样说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相对趋于稳定,缺乏活力。

### (三)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波动的周期性特征

图1记录了1979年以来36年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值的波动情况。在这36个增长率数据中,最高波动值为0.085712(2005年),最低为0.009255(1995年);有13个波峰年,分别是:1979年(0.054223)、1983年(0.021165)、1986年(0.03785)、1990年(0.066938)、1993年(0.0483)、1996年(0.025267)、1998年(0.030207)、2000年(0.053652)、2003年

(0.037568)、2005年(0.085712)、2009年(0.057255)、2011年(0.033021)、2013年(0.038564)。观察图1可知,按照“峰-峰”划分法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周期是比较合理的,这样出现12个消费结构变动周期。基于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同样的原因,这里剔除非正常的波峰年份,即:1983年、1990年、1996年、2003年和2011年。基于上述情况,这里用“峰-峰”法把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过程划分为7个周期。

依“峰-峰”法划分,1978年以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共完成了7个消费结构周期,平均波长为5.86年;从周期长度来看,2000年以后,波长稳定在5~6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周期的平均幅度为0.043035,第5和第6个周期的波幅高于整体平均波幅的水平,时间跨度为2000-2009年,这一阶段波动幅度较大的外在原因可能是2002年农村各项改革政策的推出,比如农业税改革等,内在原因则在于2000年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开始进入小康型阶段,外在与内在原因的叠加共同导致农村居民在这一阶段消费结构剧烈变动。周期高度的平均值为0.061879,最大值出现在2005年(0.085712),最小值出现在1995年(0.009255)。从峰点值的发展趋势来看,峰点值有下降趋势,但峰点值位势仍然较高。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波动曲线有7个谷点,平均值为0.019568。谷点值的最大值为2001年的0.026113,最小值为1995年的0.009255,改革开放后期的波动下限高于改革开放前期的下限。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周期平均位势的均值为0.040637,平均位势在第5和第6个周期位于0.06左右的高点位,逐渐走低。结合高度、深度和平均位势可以看出,2000年以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逐渐活跃,说明随着2002年农村各项改革措施的推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有了大幅的变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周期波动的平均活跃期为4.14年,平均趋稳期为1.71年,活跃期长于趋稳期,同样说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相对趋于活跃,充满活力。

#### (四) 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周期的比较分析

通过观察图1,发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大主体的消费结构变动曲线存在高度相似度。变动曲线上出现相对极大值点往往意味着消费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动。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其消费结构变动曲线上的1985年和2002年,这两年都位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演变过程中两个重要时间点1984年和2000年的后面1~2年。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其消费结构变动曲线上的1979年、1990年和2005年,这三年虽然不是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演变过程中的重要时间点,但1979年位于1978年改革元年之后,1990年是我国基本放开农产品价格后的1~2年,2005年是2002年农村税费取消后的第三年。这些说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演变虽然是沿着同样相似的轨迹,但是影响这一轨迹变化的因素却大不相同。

###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上述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周期性波动特征的分析显示,城镇居民(1982-2014年)和农村居民(1979-2014年)的消费结构波动都经历了7个周期,但是,这两大主体的消费结构波动的起止年份及波动的各方面特征都不相同。总的来讲,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情况滞后于城镇居民(这与从恩格尔系数角度判断的结构一致),但是,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的活跃程度较高、活力较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缺乏活力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无钱可花”。从2000年起,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呈现逐年下降态势,致使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从而低收入家庭消费能力有限不能实现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第二,“有钱不能花”。由于国内产品的技术含量低,不能满足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从而阻碍城镇中高收入家庭消费结构升级。贝恩公司2014年底发布的《2014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

在全球奢侈品市场中,中国内地消费者的奢侈品消费达到3800亿元,约占全球奢侈品市场30%的份额,去海外购买和代购越来越成为中国内地消费者的奢侈品消费新选择。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滞后也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无钱可花”。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相继实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副产品价格放开及农村税费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使农民收入增加,改善了农民的消费水平。但是,由于我国农业的生产效率并没有发生变化,同时农民进城务工受到各种限制,致使农民增收困难,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相关数据资料显示,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241升到2010年的0.355。第二,“有钱不敢花”。尽管,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起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医疗保险以及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现了全国城乡全覆盖。但是,城乡之间社会保障极不平衡,城乡间居民在住房、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转移性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另外,由于地方社保政策制度的不统一,账户信息不能共享,增大了劳动力资源在地区间的流动成本。社保制度的不完善使农村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释放。

基于上述分析,我国政府应该有针对性地制定经济政策,以促使两大主体增加消费,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从而提高居民消费率,实现我国需求结构的改善和调整。首先,尊重市场,培育完善的市场机制,理顺要素价格,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废除有失公正的歧视性社会经济政策或人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如城乡分割、行业分割和地区分割),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得劳动者获得相当于其边际产品的“公正”的劳动报酬。这些举措有助于增加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劳动收入,消除“无钱可花”的现象,进而不但实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还可以消化“过剩产能”。其次,关注民生问题,加强对农村地区民生性公共品的供给。由于,政府更重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性公共品的供给(张军等,2007;傅勇,2010),忽视了对广大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致使农村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从而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政府通过加大对农村基本设施建设和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改善农村医疗设施条件,构建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医疗保险以及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必将消除农村居民“有钱不敢花”的现象。最后,政府应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提升我国创新能力,推动我国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生产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以满足我国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 注释:

- ①本部分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或通过《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获得。  
②分别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共八类。

#### 参考文献:

- 周建、杨秀祯《我国农村消费行为变迁及城乡联动机制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吴薇《基于ELES模型的吉林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比较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  
赵金蕊《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实证研究:1995-2010》,《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李姗姗《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差异性研究》,《消费经济》2014年第1期。  
李晓楠、李锐《我国四大经济地区农户的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年第9期。  
刘妮娜、张汝飞《新生代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研究》,《消费经济》2013年第6期。  
刘海云《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升级、经济增长》,《经济问题》2011年第11期。  
查道中、吉文惠《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关联研究》,《经济问题》2011年第7期。  
张军等《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  
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